

中國肖像印大全

畫翁王學仲題



社 长:张安塞
总编辑:孙安邦

中国肖形印大全

温廷宽 编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青年路东街南巷十一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1 字数:40千字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80598—070—5

J·9 定价:68.00元

出版說明

肖形圖案印是往往被人忽視的藝術門類，其實它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

一般印章鐫刻的是文字，而肖形圖案印鐫刻的是圖畫或圖案。稍稍涉獵篆刻的人都會知道，在面積很小的印面上安排鐫刻好三四個文字，往往已很困難，更何況經營出一幅圖畫或圖案！可見一幅好的肖形圖案印必然是一件水平很高的藝術品。《尊古齋集印》著錄過一方四人樂舞印，在十五毫米見方的印面上，鐫刻兩個舞者、兩個樂人和一個酒樽。舞者長袖婀娜，姿勢生動；樂人一俯首專心鼓瑟，一仰面吹竽；中置一酒樽，以明飲宴。畫面緊湊而不局促。雖只方寸之地，而宴會場面中急管繁弦，清歌曼舞的熱鬧氣氛，卻躍然欲出，令人有動目驚心之感。至于肖形圖案印的內容，就更有其獨特的價值。肖形圖案印一般鐫刻人物、建築、鳥獸（包括漢代常見的由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組成的「四靈」）和紋樣等，其內容之豐富往往出人意料。茲略舉數例以見一斑：近年來湖南長沙出土過一幅戰國時楚國的「人物御龍」帛畫，說者或謂是墓主人死后升天之像，然而《衡齋藏印》中著錄了一方「人物御龍」肖形漢印，與楚帛畫正好互相參證。又如：近年在陝西、河南的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上，都發現一種「水鳥銜魚」的圖畫，學者對此已做過研究，但是類似的圖畫還見于戰國至漢代的肖形印中，而且有六、七十方之多，則鮮為人知。如果我們將這兩者結合起

來，再參考有關文獻（如：漢董仲舒謂，《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見《漢書·董仲舒傳》），對這個問題或許會有新的認識。再如：漢代肖形印常見一種建築形式，為其它畫象磚或壁畫所未見。總之，肖形圖案印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新的世界，有待于我們去研究、探討。

肖形圖案印盛行于戰國、秦漢和元代，過去由于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所以只在諸家印譜中偶見著錄，從無專門印譜行世。近年來，雖有一二肖形印譜問世，但遠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溫廷寬先生精于篆刻且邃于藝術史的研究，蜚聲藝壇已數十年。幾十年來，一直從事肖形圖案印的搜集、鈎摹、研究工作。凡傳世諸家印譜中的肖形圖案印均手自鈎摹，其它零星資料中的肖形圖案印，亦多方搜求，不遺余力。積腋成裘，匯川為海，其所集者已逾數千，其中有些印譜、印章經過浩劫已流失或損毀，因而此印集更彌足珍貴。今出其精華匯為本書，以饗讀者。

本書共分人物、建築物、獸、鳥、四靈（吉祥類）、龍魚龜蟲、花紋等七類，每類中又分若干小類。大類自為起迄，小類用空格分開。少量古銅器、古陶器的印模，因其年代久遠，另成一類，置于人物類之前。全書共收肖形圖案印兩千余方，其中頗有珍品。與其它肖形印譜不同，本書書前附有作者撰寫的《肖形圖案印的歷史》、《各種肖形圖案印的分類、題材和時代》、《各種肖形圖案印的藝術鑒賞》、《各種肖形圖案印主要印譜收藏所在》等文字資料，對肖形圖案印的歷史和每類肖形印的題材、年代、藝術價值，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讀者了解肖形圖案印具有導言式的意義。

肖形圖案印是一個尚待深入發掘研究的領域，我們希望本書的問世，能為美術設計、篆刻、藝術史研究、歷史考古研究和肖形印收藏，提供新的、有用的資料。

山西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出版說明

三



肖形印，又名「蠟封」、「象生印」，嚴格說來即印面上刻鑄各種人物、鳥獸、吉祥物、靈類圖案。在面積僅幾毫米見方的地方，栩栩如生地刻出各種圖案，確是一種藝術價值很高的工藝。但是，在傳世和出土的歷代印章書籍中，由于肖形印沒有文字，沒有受到重視，以往的古代印譜及論印著作，一般都把肖形印列為「雜印」之類，更增加了肖形印在今天的珍貴價值。

本書搜集了古璽印、人物類、建築類、鳥類、獸類、靈類等多種印譜，對研究當時的歷史、傳說、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編著

目 錄

肖形圖案印簡介	(一)
肖形圖案印的歷史	(三)
肖形圖案印的分類、題材和時代	(一一)
肖形圖案印的藝術鑒賞	(三七)
肖形圖案印主要印譜收藏所在	(四二)
原璽印與泥拓對照	(四九)
古銅器陶器印模類	(五七)
人物類	(六五)
建築物類	(一二九)
獸類	(一三七)
鳥類	(二二五)
四靈類(吉祥類)	(三三一)
龍魚龜蟲類	(三五七)
樣式花紋類	(三八三)
補遺	(四七九)

後記

.....

(四八八)

肖形圖案印簡介

在傳世和出土的歷代印章中，沒有文字的「肖形印」數量較少，過去是不被重視的。所謂「肖形印」，又名「蠟封」、「象生印」，嚴格地說，原來是印面上刻鑄各種人物、動物形象的非文字的戰國、秦、漢印章。有些肖形印是以外輪廓來表現圖象，有些在印面低凹之處還有階梯式的層次（兩層或三層），有的是浮雕模，表現出一定的物象體積，近似兒童玩具的泥模子。廣義地說，凡是印面上有各種物像的由商周到元代的印章，包括既有文字又有圖像以及花邊混合在一個印面的，我們概括稱之為「肖形圖案印」。

以往的古代印譜以及論印著作，一般地都把肖形印列入「雜印」之類，甚至不承認無文字的肖形印是印章，可有可無，附在最后，更少有人對它們加以研究了。過去我對於這類肖形印章，帶有圖案花紋花邊的印章以及各種不同印面形狀的印章感興趣，凡在印譜上看到一方就用筆描下一方，遇到私人收藏的璽印實物，則用印泥打出，日積月累，卅多年來，共收集鈎摹了兩千多方。結合自己對於藝術遺產的學習，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覺得這些藝術品雖然較簡單，但在內容處理和形式表現上，卻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從我國印章藝術發展歷史看來，它們是重要遺物，作為一般古器物的研究，也具有社會史料價值，值得重視。為了發掘古代美術遺產，普及印章藝術的一般知識，為了發揚和繼承我國古代美術的優良傳統，特別是提供工藝美術設計工作作參考，把它們介紹出來，我想是有意義的。

同時，關於肖形印的歷史和各種肖形花紋圖案印的內容和藝術分析，也作一些簡單的介紹。

肖形圖案印的歷史

在介紹肖形印的歷史之前，讓我們先談一談印章是一種什麼東西。

按印章在戰國以前通稱「璽」，戰國末期才出現了作為器物名稱的「印」字。從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以後，歷代字書解釋「璽」、「印」兩字的定義，基本都和許說相同，不外是代表權力和憑信之物。因此多年以來，人們一直沿襲這種說法來認識璽印。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在這里提出我的看法，也探討一下璽印的歷史起源。

璽字最古的寫法作「𡗗」，照王國維的說法是：「在簡牘之世，其用必與土相需，故其字從土。」（《簡牘檢畧考》）也就是說一種按印泥土的器物（南北朝以前無印色，都是印到泥上，類似近代使用火漆封物，出土的封泥甚多，就是古代印迹的物證）。「印」字最早見于甲骨文，作「𠄎」形，是一隻手（爪）按着一個跪着的人（𠄎）形，本來是個動詞。到戰國末期借用它作為印章這種特定器物的名稱，也還是指一種具有按印性能的工具。漢許慎卻解釋「璽」字為：「王者印也，所以主土，從土爾聲。」解釋「印」字為：「執政所持信也。從爪從卩。」（卩是古符節之節字）。他既把璽字從「土」之原意曲解為王者占有土地，又把原是跪人形的「卩」字曲解為徵信之用的「節」，這種解釋，是按照漢代制度說的。由于秦始皇規定皇帝的印章才能稱璽，臣下只許用印字，漢代沿襲秦制，大體仍作如此規定。同時，璽印多年的實際應用，又主要是在代表統治者的權力和人們簡牘、貨賄遞寄的憑信上，許慎也就有

意識地如此解釋了。其後印章在代表權力和憑信等方面的用途一直是最廣泛的，后人也就習焉不察，照許慎的說法來看待它了。

盡管璽印在歷代社會應用上絕大多數是代表權力和憑信之用，但從許多出土的古器物和璽印實物看來，代表權力和憑信既非它所特有的用途，也不是它唯一的用途。例如周代的鎮圭、桓圭、躬圭、冒（均見吳大澂《古玉圖考》），春秋戰國軍隊所用的牙璋（也見《古玉圖考》及《考工記·玉人》），戰國以來的符、節和裂繻以及后代的令旗、令箭（劍）、牌、合同等，都是驗證憑信之物，所以作為代表權力和憑信之物多種多樣，璽印也只能說是其中的一種。又如歷代出土和傳世的各種璽印實物中，除了作為代表權力和憑信的用途之外，還有多種用途，如規誠言行的箴言文字璽印（如戰國時的「敬上」、「敬事」、「交仁」等璽，秦代的「宜民和衆」、「壹心慎事」等印），取吉利的文字璽印（如戰國時的「善壽」、「安官」、「宜有千萬」……漢代的「日利」、「長幸」、「出人大吉」、「長宜子孫」……宋元時的「天下太平」……等璽印）。此外，還有道教迷信用的文字印章（漢代有「黃神越章」、「天地煞鬼」等印，據《抱朴子·內篇》上說：「古人入山皆佩黃神越章，能避虎狼。」又有「夏禹」印，據元吾邱衍《學古篇》上說：「世俗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乃漢篆，所以知之。」唐宋以後，又出現了用在書畫上的非姓名文字的詩文詞句印（據印書記載，最早始於南宋賈似道「賢者而後樂此」一印，宋元以後，文人士大夫制作詞句印很多，不勝枚舉），可見璽印的社會職能是多方面的。那麼為什麼印章在代表權力和憑信用途是那樣的長期而廣泛呢？我們知道，上舉各種圭、冒、牙璋、符、節、牌、合同等，只能憑其本身代表權力和憑信，有其數量的局限性。但璽印可

以印出印迹，是通過復制的印迹在起權力和憑信的作用，按出的印迹，反復多次，印章就比其它單一的權力和憑信之物有不可企及的使用靈活性和數量優越性，自然被人重視，長期而廣泛地利用它了。

這樣看來，印章的多種用途是隨着社會生活需要而發展變化和豐富起來的，因此不能只用一兩種社會職能作為這種器物的概念。我們應該看到，璽印與其它器物之區別，只在于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有按印復制印迹的工具性能，無論它的社會職能如何發展變化，它的這種性能卻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作為印章的基本概念，應該說它也就是一種具有按印性能的特殊器物，而不應以代表權力和憑信之物局限它的定義。

那麼，最早的璽印究竟是作什麼用的呢？這就應該談到肖形圖案印的歷史了。

我們知道，殷代鑄銅技術，已經達到高度的水平。據考古學者的研究和出土實物證明，大多數是分塊作模範，用幾塊泥模拼對起來澆鑄銅液，模上的花紋或文字先用刀刻出，澆鑄完了要打碎泥模才能取出鑄件，再鑄時需要重新制模和雕刻。由於銅器的大量生產，工作方法需要改進和提高，就另外做些銅或泥制的文字、花紋小模，以備再做時的參考，或者遇有文字、花紋樣式完全相同的，也可以把樣品印到泥模或蠟模上略加修飾再鑄，這種樣品叫做「範之範」或「母範」。用幾塊原始模子，可以節省許多精力和時間去生產銅器。所以在出土的殷周戰國青銅器中，往往看到在鑄件上還殘留着分塊鑄模的接縫痕迹，例如著名的《秦公簋》銘文，就是用許多單字模打上去的（最早的活字版），這是最顯明的例證之一。因此，我認為這類小塊的銅模或陶模，實質上也就是印章的原始雛形，它原來并不一定代

表權力或作憑信之物，刻鑄上文字的小塊範當然是最古的文字印，刻鑄上動物肖形圖案的也就是最早的肖形圖案印了。就目前所知，出土物中有一塊最古的印章，是帶印紐的亞形鳥畢文字璽（圖〇〇〇一），出土于河南安陽，系殷墟遺物，曾編入黃濬《鄴中片羽》和于省吾《雙劍謠古器物圖錄》中（據黃濬之子黃靜涵告我確出殷墟，但此物及另二方璽已流入臺灣）。這塊璽的鳥（𪇑）畢（𪇒），畢字之古寫，捕鳥獸之工具）都是象形字，亞（𪇓）形是花邊，既可認為它是文字（象形）印章，又可稱之為肖形圖案印章，因此作為肖形圖案印的史料，它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塊。從這塊璽的圖形特點看來，也絕似印制殷代銅器銘文的小塊模子。除了鑄造銅器銘文、圖案花紋所用的最古印章外，在出土的戰國、秦、漢陶器和漢代的空心磚上，還有不少用印章印出的文字和肖形圖案花紋，例如日本人太田孝太郎《夢庵藏匊》中就有一塊戰國陶片，上面用「土」字璽連續印出的一排印痕（這種方法，實際上已把文字當成了花邊紋樣）；狄平子《漢畫》中，也有用車騎肖形印和花紋圖案印印出連串花紋的漢代空心磚拓片；又如在秦漢的許多殘破的陶片上，經常可以看到「日利」、「長幸」、「日入千金」等吉語印痕，有時也會看到動物肖形或花邊，這一些更足以說明，即使到了璽印已廣泛地應用在代表權力和憑信之物的時候，作為早期制做器物銘文或花紋的用途，也仍然保留下來。

肖形圖案印的出現，是從殷代到西周制做青銅器的小塊模子而開始的，印面以銅器花紋居多。到戰國時期，除了印面刻鑄花紋的，又出現了不少刻鑄動物形象的肖形圖案印，其中有些是印制陶器裝飾花紋的小模子，有些就不一定用在印制器物的裝飾花紋上，我們目

前雖然還不能肯定其用途，但在戰國以後印章已普遍應用到代表權力和憑信之物上，那些動物肖形圖案印，可能是意味着圖騰（註）的子遺，有些已成爲象征性質，表示個人家族的往古懷念，和姓氏名字印一樣地使用着。過去曾有人認爲，這類印章中的動物肖形也就是生肖（生辰屬相），當然，生肖也帶有迷信色彩。但從現存歷史文獻上考察，漢代王充《論衡·物勢篇》始有十二肖即以動物配十二地支之說，但還沒有提到人的生辰屬相；人的生辰屬相說法，在南北朝文獻中才看到（北周宇文護《母貽護書》及梁朝沈炯《十二屬詩》）。從出土實物看來，不僅在漢、晉以前的各種器物中沒有見到過，即使是每一時代的肖形印中，這十二種動物也不完備。因此，我認爲把早期肖形印當做生肖屬相印章的看法，根據還不足，至少它們兩者決非同義名稱。

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割據一方，互相侵伐，戰爭不斷，肖形圖案印中又出現了以保疆御侮爲主題的武士形象，這是以人物形象入印面的開始，一直到西漢初期仍然繼續制做這種題材的肖形圖案印。

在過去四川出土的古銅璽印中，我們還見過一些印面既像文字符號，又像肖形圖案的印章，從印身的形制上看，與戰國印差不多，但它不同于漢民族系統的形象形文字。有的印中有個「王」字，其它似蟲、似鳥、似獸的形象很多，都不可識。清代金石學家陳介祺曾認爲：「文字奇古，非夏即商」。解放后，由于全國各地開展了科學發掘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在四川巴縣筍壩等地方的戰國到西漢的船棺墓葬中發現了不少這類形制的璽印，才明確了它們是古代巴蜀地區兄弟民族的文字或符號（圖語）、印章，并不早于戰國時期。因爲這類印章

的文字，頗接近于象形字，按殷墟出土的鳥畢文字印之例，也把它們列入肖形圖案印中。

到了秦、漢，特別是漢代，讖緯迷信盛行，陽陰五行、道教神仙之說有了很大發展，同時，在文字印中寄托人們思想、願望的吉語、箴言、辟邪等字句漸漸多了起來。肖形圖案印面的內容題材，也加入了這些方面的成份，而出現了四靈、龍、虎、鳥類、守宮、蠶等等圖像的印面。在漢代社會文化生活中，音樂、舞蹈、百戲（雜技）占着重要地位，這些題材的藝術形象已推廣到各個方面，類似漢代畫像石、畫像磚的內容形式的舞、樂、百戲，也刻鑄在印面上。另有一種建築物圖形的印章，在建築物頂上有鳥形，建築物中有鳥獸或人物活動，也頗似漢代畫像磚、石的內容和形式。這一時期，作為人物題材的肖形圖案印，還有人搏虎、人牽馬、牛等題材，可能是反映狩獵或畜牧生活的。除此以外，以各種鳥類如鳳、鸞、朱雀、青鳥肖形人印的也不少，有的在姓名文字印面四邊、印身四側以及背面（兩面穿帶印）刻上了四靈、龍、虎、龜、鳥、魚、蟲種種圖形，而成爲文字與圖形綜合性質的印章了。

總之，東漢前後時期，肖形圖案印的內容題材，是多種多樣的。它們較全面地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事物和風俗習尚，在藝術表現形式上，也豐富多彩，精緻動人。本集所收以東漢物最多。

魏、晉、六朝時期，印章藝術已逐漸衰落，肖形圖案印的制做也較少了，肖形圖案印面的題材內容和形式，大體仍近似漢代肖形圖案印，缺少新的發展變化。

隋、唐到宋初這一階段，印章藝術越加衰落，文字印章制作粗率，肖形圖案印則更爲少見了。

宋末元初，印章藝術又逐漸爲士大夫階層所提倡，屬於這一階層人物所用的印章，例如在書畫鈐記上，很少看到以肖形圖像或花紋入印的。但在群眾中卻較廣泛地流行着押印（行、楷簽字體的文字印）和花印。所謂花印，也就是宋、元之際的一種肖形圖案印，其中較常見的大約有：官吏、兒童、兔、鷄形象和瓶形、葫蘆形、銀錠形、鼎爐形、琵琶形、鷄頭壺形以及各種花朵、花紋圖形等等印面。同時還出現了不少雙魚形、單魚形的合同印，有的在魚身部份還刻有「合同」二字，很明顯地使人認出是使用到契約上的。除了花印和字畫結合的押印，元代及以後還有大量的所謂「銅十字」，這種東西形制扁薄而大，印面所鑄大致可分十字形、鳥形和花紋三種，原出土于內蒙呼和浩特一帶，據說以前當地牧民外出牧羊時，就用銅十字印泥封門。一九三四年《齊魯大學季刊》曾出過專號（加拿大籍教授明義士所編），所收約千方左右。并有考證文字，據說原來是元代也里可溫教（即基督教）徒所用之押，後來經過改造，就成爲當地人民的常用之物了，所以已不完全是原來的宗教藝術形式。圖案花紋也有了變化，其中的鳥形按基督教義應爲鴿。日本人佐伯好郎則認爲印面不平，不適于作印章之用，伯希和、史培志又認爲是護身符或「壓鎮」之物，也有人認爲是宗教性的徽章。元代花印和銅十字，全部都是朱文，藝術造型簡樸淳厚，反映了民間美術的特點。

明清以來，由于書法、繪畫藝術的發展與石質印材的廣泛利用（雕刻方便），雕刻印章似乎成爲書畫家所應有的一種技術，印章藝術又進入了一個空前發展階段。但在制作肖形圖案印方面，卻并不被人重視，有的也不過只是模仿前人作品，很少有新的創獲，這里就不再介紹。